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第一集

常绍温
主编

广东人民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

常绍温 主编

第一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九月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

常绍温 主编

第一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13印张 197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18—00578—0/K·128



定价3.50元

序　　言

——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进行专题探索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而历史文献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明发展程度的历史标志。我国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整理和研究现存的历史典籍，对于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化，总结我们民族在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成就和历史经验，有着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对历史文献和其他文化宝藏的系统整理研究，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创建与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不可或缺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任何国家的文化不能离开本国的民族传统。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随着民族的产生形成，文化就具有了民族性，并且以民族的形式向前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汉民族的形成，也是与其他民族经过长时期混血、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创造，但由于汉族文化历史悠久，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数，无论是史前文化遗存、口碑传说或有史时期的文字记载，就总体而言，一般都比同时期兄弟民族发生早，发展快，程度也高。即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属有严密规范的文字，甲骨文组成的卜辞则是以贞卜形式出现的历史记事。从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到，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纪商殷奴隶社会的经济文化，不仅早于我国境内各兄弟民族，就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也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周代礼制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后世影响更大，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轨道和面貌；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在思想界放出异彩，使我国古代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夏商周以来的古代文化，都属阶级社会的文化，研究三代以来历代文化发展的过程、成就和特点，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是重要的环节。即如春秋末孔子首创的儒学，成为先秦诸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被后来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变化、内部流派的出现和各朝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学说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已不全同于孔子时代的儒学。不论儒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作为封建时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和学派，后人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历史地位。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传统，就民族这个范畴来说，主要是华夏族——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汉族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兄弟民族或起潜移默化作用，或发生某种形式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它也不断汲取兄弟民族文化乃至外国文化的某些部分，丰富并更新着自身，把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推进

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其特出的持续性和凝聚力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传统力量，没有任何外来文化曾经能于取代。

因此，整理研究现存的历史文献、文化典籍，清理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从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澄清两种观点，一是所谓“全盘西化”以及把中国传统同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的看法，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者的理论根据之一。全盘西化论者认为西方文化至高无上，抹煞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其腐朽性，特别是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文明之对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侵略、渗透。任何国家如果一任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势力长驱直入改变自己，就必定会沦为它的附庸，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血的教训，为此中国是吃过大亏的。我们要学习、引进的西方文化是其中的先进成分，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用的部分，因此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事实上，所谓“全盘西化”，在理论上固然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我国的近现代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重要的是，反对“全盘西化”并不是说我国传统文化中一切都应该继承发扬；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不等于食古不化，搞盲目的祖先崇拜。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容并蓄。”“中国现时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

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新民主主义论》）这里，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创造的文化，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取消主义态度，而是应该树立民族的自信心，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我们现在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不应也不能离开民族文化传统的。这是一。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特别是长期封建社会中发展、留存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要运用历史的辩证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既考虑到它们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又要分清何者是民主性精华，何者是封建性糟粕，批判地继承并加以发扬。这里既不是不加分析、不作抉择地兼容并包，也不应混淆概念，把传统文化和封建糟粕划等号，在反封建主义的旗号下对封建社会创造的文化一概打倒，全部抹煞。这就有必要开展“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工作，同时也要求我们对古代文化遗产首先应该保存，而不是消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分析抉择，批判地继承并发扬其精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各有关单位的人文学科工作者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工地进行。我们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即古籍研究所）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小分队，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青年，自1984年冬建所以来，在教委古委会和本校领导的支持下建立起工作队伍，开展工作，工作重点是整理研

••••

究古代文史典籍文献，同时也进行文史哲方面的专题探索。大家认为，这种专题探索有助于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工作，也可说它本身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不揣鄙陋，将探索所得写成专文，汇辑成这本小册子，就教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今后倘条件允许，还拟继续刊行下去，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常绍温

一九九〇年七月于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

目 录

| | |
|---------------------------|-----------|
| 序言 | 常绍温 |
| 岭南学者梁廷楠 | 陈乐素 (1) |
| 孔子与“六艺” ——论中国文艺思想的理论准备 | 毛庆其 (16) |
| 孔子著《春秋》的若干探讨 | 李 坤 (33) |
| 关于《诸葛亮集》中伪作的探讨 | 袁钟仁 (48) |
| 《李娃传》与唐代城市生活 | 林立平 (65) |
| 唐朝诗人的和亲观 | 吴溢球 (82) |
| 浅析杜甫《绝句二首》之一的美学 风格 | 姜小平 (92) |
| 张咏——宋代治蜀第一人 | 张其凡 (97) |
| 《朱子语类》带“得”补语的两个问 题 | 林广志 (128) |
| 《文溪存稿》作者李昴英生平考略 | 杨芷华 (147) |

- 元代赛典赤家族对云南地区的开发和经营 汤开建(166)
- 费密对理学“成人之道”的批判 肖 钢(195)
- 陈维崧诗辑佚 陆勇强 辑(207)
- 阮元创办学海堂与广东学术风气的转变 常绍温(225)
- 《海国图志·朝鲜国图》地名考释 陈 华(250)
- 浅谈广州方志中的“小说” 辛 谷(269)

岭南学者梁廷楠

陈乐素

梁廷楠，广东顺德人，生于清嘉庆元年（1796），卒于咸丰十一年（1861），66岁。清史有传。他以《粤海关志》、《夷氛闻记》、《南汉书》等作著称。1934年，冼玉清发表《梁廷楠著述录要》于《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期。“史传”和“录要”都有助于我们对梁廷楠的研究。我现在就他所处的时代，试作论述，就正于同志们。

清朝康熙乾隆是强盛的时代，但嘉庆开始，便逐渐走下坡路了。到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失败，二十二年（1842），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清帝国覆灭。

梁廷楠的一生，正当嘉庆初到道光签订“南京条约”之后20年，即时局大转变的前后时期，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受到影响而有所转变。他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生重在学术研究，后半生则致力于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而前后两个阶段都在他的著作中有明显的表现。因此，我现在就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论述。

一、梁廷楠的前半生

1 家庭状况和环境

梁廷楠是顺德县伦教乡人。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中，经济比较发达，在当时就以蚕丝和渔业的生产著名。由于有经济发达的条件，并受乾嘉学术风气的影响，从乾隆时期算起，如罗天尺、温汝适、龙廷槐、黎简、黄丹书、仇巨川、赵均、冯龙官，包括梁廷楠本人，都是顺德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没有经济条件是不可能的。

梁廷楠的家庭，不是巨富，而是中产之家，在学术上，有家学。他的族祖梁善长，乾隆进士，官至建宁府同知，著有《赐衣堂文集》、《鉴堂诗钞》、《广东诗粹》等。关于梁廷楠的家庭、家学和师承，顺德人龙官崇写的《重印〈藤花亭书画跋〉序》有简明的叙述：“考厥家卷轴、夹册之所自传，盖昉于舍人（廷楠）族祖善长；著述甚富，尝为白水令，擢建宁同知，抵任仅八月而卒于官。其孙之任既世承其家学，于是从游者众，而澹缘居士为最早。及门有何太青者，亦尝官嘉兴同知，即序所称姊婿藜阁司马者也。澹缘有兄彝，侈聚宋元名蹟，时与黄廷綬、黎未裁、余应占诸名士讲贯书画源流，复招梁章钜授舍人读。嗣同县冯龙官亦馆伦教，序于二子故亦称焉。澹缘居士者，舍人父礼覲之别号也。尝游太学，婚陈氏于闽，读书武夷三年，归，经十八滩，舟破，呕血，遂与同门吴显庸、任授之习静西樵之二子，舍人幼尝游其门，故序亦称焉。会海盗张保等失食扑岸，（澹缘）移寓大良，转避佛山，累世藏翰于是乎靡，仅

择其轻便耐摩挲者，携数卷以行。旋复病歿于家。时嘉庆十五年（1810）首，舍人肖馨龄云。是编三世积财产，赏鉴至豪，洎乎舍人好著于录。”序的作者龙官崇掌握了不少有关梁廷楠的材料，重刻了10多种梁廷楠的著作。序里告诉我们，廷楠的族祖是梁善长，善长的孙之任。之任的学生有何太青，是廷楠的姊夫。伯父名彝。父亲字礼巍，号澹缘居士。母亲陈氏。廷楠的老师梁章钜、冯龙官、吴显庸、任授之。可惜的是，没有提及他父亲的名，只说字礼巍，号澹缘居士。

梁廷楠从小生活在一个学术研究气氛比较浓厚的家庭，又不止从学于一两位老师，更兼家传钟鼎彝器以及其他金石、书画等实物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环境培养下，养成好学钻研的习性。还有，19岁的那年，他在广州的旧书店“购获精本商周彝器铭约百十余件，半为《博古录》（黄长睿《博古图说》）、薛氏《款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吕氏《考古图》、王氏（俅）《嘸堂集古录》及阮氏（元）《积古斋款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诸书所收。”在这里不单可以看到他的爱好和博学，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广州的学术气氛——在旧书店中居然可以买到这样专门的、大量的珍品。刚刚步入青年的梁廷楠之能有这样的识力，没有家学、没有自己的勤奋力学，是不可能的。当时广州的学风确是相当盛，有越华、禺山、西湖、文澜等四个书院同时存在，其中文澜书院就是何太青（他的姊夫）等筹建的。

2 青少年时期作品

在有教养和个人爱好的情况下，梁廷楠23岁时写成《金石称例》四卷，次年成《续编》二卷，就是利用家传的拓藏。自序里说：“春来无事，发阅藏碑，积为此帙。始三代，迄五季。每条先标大意，证以原文数语，泐者缺之，他书可以补者补之，中有互证发明者，附以按语别之。”从这里透露出，他是在学习乾嘉考据学。初生之犊不畏虎，其中不免有些疏略之处，是可以谅解的。

28岁，他又写成《论语古解》十卷。自序里说：“国朝竹垞、西河两先生，于群经博极考据，犹未获一见‘皇疏’而详论之。幸际休明，久远湮没之篇，应运复出，自宜合之汉唐诸说，荟萃成书，存古义之一线，用彰稽古右文之盛。”这里又透露出，他之所以写这书，是因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引起的。“提要”曾说：皇侃的《论语义疏》“藉海舶（日本来的船）而登秘阁，存汉晋经学之一线。”他肯钻研而又有机会看到这些书，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30岁，他写成《断缘梦杂剧》一卷。在自序里说：“先是借他人酒杯，撰《江梅梦》、《圆香梦》、《昙花梦》三杂剧，业师李太史（黼平）谓宜添其一为小四梦。秋赋新返，客履绝稀，枯坐短檠，若有所感忆，辄为斯剧。”对此剧，台湾出版的《续四库提要》解题中说：“盖以秋试赴羊城，客中偶有所眷，试罢归来，感而为此，盖自寓也。”从剧中第四折所述来看，“续提要”的看法是有理的。旧社会

的文人，客中难免有此恶习。但过了30岁以后，他逐渐专意于历史的研究了。

3 南汉、南越的研究

梁廷楠秋试落选归来，断缘梦罢，思想上逐渐转向史实的研究。道光九年（1829），34岁，乡居写成《南汉书》十卷。在自序中说：“廷楠少寓河林（广州光孝寺），拓读两铁塔题銙，核与吴书（吴任臣《十国春秋》）多不合。是时已思别著成一家言，方为科举之学，因循弗果。近此数年，翻阅藏帙，遇事涉南汉者，辄首尾录存巨册。今秋归自五羊，取所积荟萃而条理之，厘为十八卷，《考异》如其数。”他的所谓“少寓河林，拓读两铁塔题銙。”就是十四五岁时随着父亲习静于光孝寺，看到父亲所拓寺内两个铁塔中的题銙，即龚澄枢的《西铁塔记》和李托等《东铁塔记》。30岁以后，把拓本翻出来，积久写成书。他的目的在于“使其事实瞭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书写成后，曾请吴兰修提意见。当时吴兰修亦正在研究南汉史，读梁书后，提出书中若干条错误。他们反复磋商，梁曾有《复吴石华司训论〈南汉书〉》的一封长信致谢。后来吴兰修费10年之力建成《南汉纪》五卷，书中就曾引用梁廷楠之说。梁廷楠写成《南汉书》和“考异”之后，又有《南汉文字略》四卷、《南汉丛录》二卷，对南汉史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对《南汉书》的评价，有谓“堪与陆游《南唐书》媲美，”也有人认为“于南汉之事，可谓洪纤毕举，但叙事简洁，远在游下。”

梁廷楠在写成《南汉书》和《南汉丛录》等对南汉史的研究著作后，又远溯南越的历史，于道光十三年（1833）38岁时，写成《南越五主传》三卷和《南越丛录》二卷。两书自刻于当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龙宫崇重刻，列入《自明诚楼丛书》中，并作跋纠正其中若干错误。他的“五主传”原作是收集古籍中的零断材料，经过考据而编成。自序中说：“自束发迄今20余年，所见大略具是，终以不获旁搜博采为嫌而无可如何也。”他确是认真的，但不够精细。其他史著，也有类此情况，博而不够精。

他钻研史籍，还曾在道光十五年（1830）35岁时，编辑了《东坡事类》二十五卷。在自序里说：“收书自正史以迄说部、诗话及节引本集之事，因文见教，每条明著书名、题目，略为第次。”何仁镜作序，说此书“于先生之逸事与其文章风节，凡官之所以黜，党之所以分，交游之所唱酬，仕宦之所历，莫不纲举目张，若指掌，若刊眉。”此书对研究苏东坡的生平，确有补助，读者自知之。

梁廷楠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乡居，有事才到广州城。《夷氛闻记》卷二有注，谈到他曾对林则徐说：“素居江村，未尝授读省会”。他的金石、文、史研究，都有成果。他之所以乡居研读，与他的家庭处境有关：十五丧父，上有守寡的母亲，而“终鲜兄弟”；家非富亦非贫，能自刻书，以奉母读书为乐。他的史学成果，仍以南汉史的研究为著。

二 他的后半生

梁廷楠丧父后，母亲切望他一举成名，督责很严。但直

到道光十四年（1834），他39岁，才得选副贡，那是与时势有关的。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清廷的腐败情况已经日趋严重，大量的鸦片输入，毒化中国，同时引起大量的白银外流，而清政府的税收以银两为标准，因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的海盗与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频频扰掠边境，而以广东沿海所遭受的最为严重。试举吴应逵撰的《监察御使邓公〈士超〉传》中所述的具体情况，即可见一斑。邓士超嘉庆十一年（1806）上疏：“臣籍隶广东，请假回籍，窃见各府州县，盗贼充斥，奸宄横行，风俗败坏，民生穷困，地方官不肯认真整顿，诚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体皇上肃清吏治、绥靖海疆之至意。谨就见闻所及，胪列五条，敬为皇上陈之。

一、粤东海盗，向在外洋肆劫，近年以来，沿海口岸及内河之盗，较外洋尤甚。……一、奸徒结会拜盟，……尤凶悍者，身带双刀，横行无忌，名曰‘大货手’。广州、南雄、韶州等属尤甚。……一、棍徒开设赌局，名番摊馆，招集无赖，凡勾通洋匪之土匪及四乡漏网案犯，多混迹其中。现在城厢内外，开设纷纷，附郭南海一县，即有十七八处，佛山镇亦四五十处。各衙门长吏役人等，互相盘结，收纳赃银，岁计巨万。一、鸦片乃淫药之一种，而为害尤烈。近者省城内外，公然开设烟馆，工商士庶，靡然成风。宴会则以之款客，嫁娶则用作妆奁。廉耻丧尽，可为痛心。现由闽、粤延及各省，以及京城内外，亦均有私贩、私销之处。粤海关监督稽查洋船洋货，是其专责。闻该处把口书役人等，递年坐抽私税，盈千累万，因而擅放入关，直行无阻。该监督难保无收受陋规、通同放纵情弊。……一、粤东浮收钱